



月光城 小说

先生老胡

董改正

下岗失业那几年,我在淮河北路的超市门口摆了一个书摊。老胡就是那时候认识的。

跟别的书摊相比,我的一直都是冷清的,虽然我的市口最好:超市正对门,自带流量,摊前正好一盏路灯。但我卖的是出版社清仓货,它们要么是文史哲,要么是古今名著,没有《知音》,也没有《大案揭秘》或《哆啦A梦》,一本正经得就像我的着装和表情。这只是我门前冷落的原因之一,更重要的是我的服务态度——我是拿着进货单卖书的,进价加百分之二十,少一块也不行,态度高冷,常常被“呵呵”——谁信你的进货单是真的呢?现在想来,那时所为只是下意识的“特立独行”,以维护可怜的自尊罢了。

那个夏夜,我的摊子上依然冷清如故,只有一个身材高大,背微驼,行动迟缓,头发花白的六十多岁老人蹲在那儿看书。隔壁小罗的摊子上,已经人满为患了,有读者便拿着书来到我摊前,就着街灯翻阅。小罗睥睨四顾,大声让那人过去,怕他拿走了。有人便看着我的书摊问小罗怎么不给我一笔转让费,把地腾出来,“反正他那儿也没生意”。小罗睨了我一眼,意味声长地笑笑。

那人已经看了有两个小时了,除了偶尔换下承重的脚跟以外,他几乎一动不动地静静翻阅。看过的书一本本地摞起来,摞了颇为壮观的六堆。我扫一眼,笑笑。这样的顾客我见得多了,往往摞得越多,买的可能性越小,不必高兴太早,所以并没有过去招呼。

“老板,过来帮我算算多少钱。”老胡站起来,腼腆地说道。一口浓重的上海郊区口音,若不是场景明确,我可能根本听不懂。

我加码洋,算折扣,报价格。他听后思量半晌,才疑惑地复述了一下我的话,只不过将我句末的句号改成了问号。我心知肚明,淡笑着对他点点头,重又坐下来,没有给他拿袋子装书。

他掏钱,十二张百元大钞,递给我,依然腼腆着说:“剩下十几块钱就别找了。”我有片刻的恍惚,不敢相信是真的。

这个老人便是老胡。在

这里我曾想称他“胡老”,但一想他生前如此局促害臊,去后也必定还是一样,我不想让他不安,便就跟他的朋友汪老师、朱老师和李老师一样称呼他,地下的他若能听见,一定不但不以为怪,反而觉得轻松,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来。

自那之后,老胡成了我的忘年交。他每天或黄昏,或晚上,不论冬夏炎凉,一定会来我的摊子上看看,必定至少买一本。有一次他看了半天,选了一本《西游记》,我记得他已为孙女买过了,便提醒他。他笑着摆手,说:“没关系,再买一本。”我没有卖给他,他就像一个下棋让子太明显的对手,我虽然感激,但不好受,心里却愈加尊重他。

老胡带动了我的生意,慢慢地,人们相信了我手里的进货单,也理解了我卖书的方式,我的摊上虽然看客依然很少,但成交量却开始比小罗大。小罗见状,便也淘了同类型的书。有一天下午,老胡刚从我的摊子上起身,小罗便殷勤招呼,老胡迟疑半天,还是过去了,买了有三堆,有七八百元。买好后他看向我这边,我只作不见,他便从小罗那边悄悄走了。说实话,我有些难过,不仅仅是因为生意,还有遭遇“背叛”的伤心。毕竟老胡也知道,我和小罗吵过架。

接连三天,老胡都没再来。第四天来时,他依然跟往常一样拿烟给我,然后蹲下来翻书。我告诉他没进新货,他还是找了一本以前翻过没买的书,我心下一暖,拒绝卖给他,劝他去小罗那边再看看。他欲言又止,那边小罗已经招呼了,老胡看着我,我故意转身去理书,他便忍不住又过去了。结账的时候,我看见老胡拿过小罗的进货单仔细看,默默心算着,不由想起他从不看我的,我说多少便是多少,心里的难过便缓解了许多。

真正让我们冰释前嫌的是那个大雨骤降的傍晚,当时我进了新书,老胡正在我摊子上翻看,大雨便在此时毫无征兆地灌下来,秒秒钟我便全身淋透。行人纷纷闪避,几个书友放下书,避到超市的屋檐下。我慌忙拿雨布盖好,但地上很快积水,如不迅速收到三轮车里,所有书籍都将报废。

三轮车上搭着一块布,摊子上搭着一块,收书入车将有六道程序:弯腰掀布,搬书,再盖好,掀三轮车布,放入,盖好。只需三次弯腰,积水就应该四面包抄过来,将书完全浸没了。我已经绝望,欲哭无泪。

老胡没有离开。他钻进我摊上的盖布下,膝行,将书摞起,由边沿移至书摊中间,然后站起来,快步跑进雨中,搬来几块石头压住盖布三角,再钻进去,头顶着脏兮兮的盖布,双手抓着盖布边沿,大声喊着手忙脚乱的我快将车推进盖布里。

那天,所有书摊都损失惨重,而我的毫发无损。

自那以后,老胡依然偶尔会去小罗那边买书,会拿过来,坐在我特意为他准备的凳子上,翻给我看,说买它的原因。老胡拎着一袋书坐在我的摊子前,或缓缓往回走去的情景,是淮河北路夜市标志性的背景。不论是坐着,或是行着,都会有书友跟他打招呼。

“胡老师,又买书呢?”

他笑,停下来,打开袋子,问的人便笑眯眯伸头过去看。

“胡校长,又买书啊,家里放不下了吧?”

他便腼腆地笑,说是放不下了。

“胡老,不能再买了,老伴又要跟你吵了!”

他依然是笑,说“没事没事”。

有一天汪老师目送他走了,叹息道:“一辈子爱买书,爱看书。那次我们去上海开会,雨过天晴,他穿着长胶靴,裤腿卷着,在南京路上呱呱唧唧地走,到书店里看书,害得大伙等他半天。”

“他乡音改不掉,说话学生听不懂,一肚子学问排不上用场,就调到干部学校当副校长了,专门研究,也是得其所哉了。”

朱老师也叹息:“他心思都在书里。夫妻感情一般,儿子的工作他也没用心,现在在一个小饭店做厨师。”

李老师冷嘲道:“老胡就是个傻子,买那么多书有个屁用?再给他三辈子,也看不完!他要是死了,他儿子一股脑当破烂卖了!我是再也不会买一本书了,再买我就是孙子!”结果,他还是又买了一本。

我听得心酸。我知道老胡有许多弱点,但他真诚,他坦荡,他也许并不能察觉到他在现实中的失败。既然察觉不到,

那么不就是幸福的吗?幸好如此,但愿如此。

老胡消失了一个礼拜后,我才知道他得了肝癌。我去医院看他,他强撑着要坐起来,局促不安,他不习惯被关注被呵护。一个月后他出院了,休养一阵子又出来买书,只是行走更慢了,脚步更虚浮了,脸上长出了大块的老人斑。我心里隐隐不安,怕他有事。他看出了我的心思,笑着说手术很成功,他好了。我只能在心里暗暗祝福,连在汪老师处求证实情都不敢,我得保存着侥幸。

时间慢了下来,秋天过去了,初冬开始了。霜降之后,风陡然硬了,路旁的法梧开始哗哗地落叶,我连续三天没见他的身影时,便开始坐立不安起来。答案隐隐显现着,但我不想知道,不想看到,也不想去他家探望。

噩耗还是来了,老胡走了,虽然与癌症有关,却并非直接死于癌症。死者已矣,生者的日子还要继续,我不能多说。我去的时候,他已经火化了,他在墙上腼腆地笑着看我。他儿子接待的我,他知道我,他的父亲不止一次跟他说起过我。他默默地领我走进他父亲的房间,我坐在空空的床板上,心里钝钝地痛。世上再也没有老胡了。我的眼前,不断闪现他的样子,他缓缓地行走,他腼腆的微笑,他笨拙的声音……尤其忘不掉的是他头顶盖布的情景:花白的头发淋得如同肮脏的拖把,大雨灌注,他不断地眨着眼睛,他浑身湿透,泥土糊满的衣服紧贴着身子——他虽然局促,却一直那么庄严;他虽然随意,却一直那么整肃。但是那天,他那么狼狈,那么不体面。

再去摆摊的时候,我听见有人跟我笑着说:“小董,老胡走了,你损失大了。”虽然太阳暖洋洋的,我依然觉得冷彻骨髓。

我让出了那块地,不再摆摊。

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:“老胡死了,损失最大的是小董。他干不下去了。”

起初我不知道有老胡,孤寂都可以是骄傲的;后来我遇见了,孤寂便不可忍受。这条路上,老胡再也不会出现了,我又何必守着呢?

老胡如果知道这事,他一定会局促不安。他不习惯被突出,不习惯被关注被过分尊敬,但是他一定会欣慰。他是懂我的,正如我懂他一样。